

## 自由主義體制與法國第五共和文明化 歷程中的總統角色與衝突

劉名峰

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

### 摘要

如何理解第五共和的左右共治？本文從此間制度所在的社會脈絡，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國際體制入手。尤有進者，對於新自由主義體制的內在動力，更進一步參照著現代文明化歷程中的「自我—我群」認同平衡來掌握。因此，本文首先指出，作為民主國家之中，制憲次數最多的法國並不是個特例，而是個特別敏感地反映了現代世界裡，個人與社群之間張力的案例；其次，此一張力對於 1980 年代之後逐漸發展的新自由主義體制來說，它激起了強調社群的左派，與重視個人之右派間的緊張，並造成了三次的左右共治。而總統的角色固然在左右的衝突之際，表現了國家統一的意象，但其魅力更多是基於制度而具有正當性，實則由於全球化下的管理主義，不僅個人魔魅的效果大為降低，而且還由於總統的任期在 2000 年時修改為五年，並與議會選舉時程配合。因此，雖然左右的衝突仍在，但只是讓隨後的總統都只有一個任期而未連任，而共治的現象也因為制度的修正而不容易出現。

**關鍵詞：**第五共和、新自由主義、文明化歷程、總統、左右共治、正當性

## 壹、前言

法國第五共和體制在台灣，一直是憲政體制研究的重點對象。本文延續先前以〈戰爭狀態、元首地位與憲法變遷：法國制憲中的結構性力量〉為題的研究（劉名峰，2019），繼續以「文明化歷程」（civilizing process）（Elias, 2014）的理論為中心，試圖對第五共和的研究有所貢獻。在先前的研究裡，筆者首先指出法國憲法的變遷，並不能以其特別多的制憲事件而當它是個特例。它是個表現文明化歷程中之個體化與自由主義，在現代政治場域中取得主導權之後，一個特別激烈地表現人們在「自我—我群」之認同的平衡裡，追求自由與秩序的個案；其次，在追求「我群」的凝聚及秩序時，與「國家機關」（state）對應的「國族」（nation），具有關鍵的地位，其所具體化的個人，如君主或總統等元首，也獲得了高度的正當性；再者，自由主義的現代政治秩序不僅引起了內部封建秩序的瓦解，也掀起了週邊國家的反制。此間動盪的情勢，及隨之而來的戰爭狀態，更強化了元首的正當性；最後，由於文明化而減少了國家內部的暴力，制憲事件也相對減少。1848年之後，法國即不再出現由於暴力而制憲的事件，而在1958年制定的第五共和憲法，其實也反映了法國所處之地緣政治的文明化，因為它發動的原因，是為了解決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後，法國也未再經歷與它國的戰爭。

當然，地緣政治的文明化並不是全球性的，然而在法國所處的西歐地區確是如此。其中，不僅自二戰結束之後，聯合國的發展、國際人權運動的推動等等，都有減少暴力的效果，而為文明化的表現，就本文研究的第五共和憲法來說，為其倡議背景的阿爾及利亞戰爭，即是戰後西歐殖民帝國瓦解，而殖民地獨立的初聲——文明化歷程的理論，首先指出了暴力在政治場域中大幅減少的現象（Elias, 1982）；其次，本文再配合著國際政經體制，進一步指出在文明歷程裡的自由主義，實際上不同的時期還有不同的內涵：1870年建立第三共和之後，國際社會也步入古典自由主義時期，因為強調自由放任的價值，遂使得人們對於正當性的感受，也就不容易接受強勢的行政權，故而雖然內閣羸弱，政府仍然持續運作；戰後的鑲嵌自由

主義強調的是福利國家，因此需要並接受強大的行政權，故而第四共和即使與第三共和差異不大，但仍於 1958 年退場，而且第五共和之總統的正當性，還透過直選與兩輪選舉進一步強化。然而 1980 年代中後，由於新自由主義的體制而使得左右衝突的情境激化，不僅出現了一連串共治的現象，法國政治在 2002 年之後仍擺盪於左右之間，只是由於 2000 年的縮短總統任期及變更國會選舉時程的修憲，而不再出現共治的現象。最後，2000 年修憲之後，不僅至今未再出現連任的總統，其政黨在國會中的席次還變化劇烈，這除了代表了總統角色在行政權上，無力面對全球化時代的局面之外，也代表了其所呈現的國家象徵意義，更多是由於職位的原因，而與個人的關係不大。

透過對法國憲政體制的變遷，特別是第五共和期間的政治發展，本研究探索正當性的內涵，及其有效的脈絡：一方面，它對應著國際政經體制（international regime of political economy）之自由主義的不同形式，而使得人們在不同的時期裡，也就對行政權及元首，有著不同的要求；另一方面，貫穿了這些不同時期的國際政經體制，還由於總體層面上文明化的發展，出現了暴力減少的趨勢。因此，法國政治場域逐步地離開了「戰爭狀態」，並使得與元首有關之正當性的形式，也就是「克里斯瑪」（charisma）的個人魔魅，脫離於特定個人而存在的情態。換句話說，左右共治期間，固然總統與總理之間會因為權責上的重疊而出現緊張，還由於全球化時代裡的外交，經常與其它內政事務難以區分，更強化了總統與總理之間的衝突。然而，基於總統更直接地作為國家的象徵，而使得外交及國防事務為其「保留範圍」（domaine réservé）。此即使得第五共和的體制在左右共治的衝突之際，總統會獲得更多的支持。不過，正當性向著總統的方向收斂，也使得總統更容易被要求得承擔政策的成敗。2000 年後的法國政壇，不僅至今未再出現連任的總統，國民議會的席次仍在左右之間搖盪著，且其幅度還愈來愈大。這代表了個人魔魅的兩種形式，個人的與制度的（Greenfeld, 1985），已然由於文明化的發展，而更強調制度的層面，並減少了對於特定個人的附著，這不僅源自於二戰結束之後，法國處於戰爭的狀態減少，而管理主義增加的文明化歷程，也由於全球化而使得政治之工具化的現象益加明顯所致。

有鑑於此，誠然衝突會向著總統的方向收斂，但卻也因為國家在全球化時代之能力有限，使得總統難以連任，政治支持也在左右之間激烈擺盪。

## 貳、法國憲法的特質及 1958 年的制憲——總統的地位

本文雖是以第五共和作為研究的對象，但是藉著文明化歷程的視角，對於總統角色及憲政體制之發展的解釋，並不能限縮在 1958 年之後的歷史，而要從長期的體制發展中，掌握法國政治的「形態」(figuration) (Elias, 2010)。有鑑於此，這一小節將分成兩個主題：第一，拉長了法國憲法的時空脈絡，從中掌握該國政治體制的特質；第二，藉著其間的特質，進一步指出 1958 年第五共和制憲的背景。簡單地說，也就是說明總統的地位。

### 一、法國憲法的特質——文明化歷程的視角

與其它西方老牌的民主國家比較起來，法國憲法的歷史不僅悠久，而且豐富——1789 年的大革命之後，法國政治經歷了相當長時期的動盪，不僅政府更迭頻繁、制憲的版本不斷推陳出新，自 1791 年到 1958 年之間，共出爐 15 部憲法。而且，國家內部不僅有激烈的暴力手段，外部還與週邊國家持續地發生戰事——這些高強度的衝突，除了與三級議會體制在大革命中崩解有關之外，更直接地來自於法國大革命所代表的是現代自由主義的政治體制與理念，而自由主義不單單推翻了前現代的封建體制，同時也引起了鄰近國家的結盟與反制。在這裡，筆者要特別強調的是，此間鄰近國家的結盟與反制，其實不只是在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的七次反法同盟等的事件，也在於反自由主義的結構性力量。這力量與文明化歷程中的個體化有直接相關，因為它一方面打造了個體的現代世界，即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市場機制，以致於強調個體的法律及社會文化，但在另一方面也由於個體的文化，所帶來之孤單、寂寞、疏離與不安，而強調了社群凝聚的需要。簡單地說，對就是「自我—我群」的認同平衡 (Elias, 2008)，或也就是「自律性市場—社會保護」的雙重運動 (Polanyi, 1989)。於是，也就法國革命之後，自由平等與博愛等的現代政治價值即隨著拿破崙向歐陸擴散。而且，

它們並沒有因為拿破崙的戰敗而消失，只是受到 1815 年的維也納會議及歐洲協約所壓抑。但是，自由主義的火苗持續漫延，並且在「自我—我群」的認同平衡與「自律性市場—社會保護」的雙重運動中，同時引發了保守主義的反撲。

於是，歐洲協約可說是 19 世紀前期的保守主義的陣營。然而，隨著普魯士的快速發展及德國的統一，反自由主義陣營的中心在 19 世紀後半，逐漸地轉向新興的德國。當 1870 年普法戰爭結束、德意志帝國成立之際，也造成了法國第二帝國的拿破崙三世政權垮台，第三共和國跟著成立，而法國君主制度則正式結束。1871 年，激進左派人士成立巴黎公社，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的政權。不過，巴黎公社為期不久，即遭保皇派的軍方血腥鎮壓。1870 年代的法國政局持續地糾結於保皇派與共和派之間的衝突。1879 年 1 月，麥克馬洪公爵辭去總統一職，正式標誌了保皇派退出法國政壇的主流，而由共和派主政下的第三共和，不僅逐步地深化共和國的體制、鞏固自由主義的價值，還成為截至目前為止法國憲政史上最長壽的體制——自 1870 年起到 1940 年因二戰而結束，共計 70 年。相對的，本文要討論的第五共和則自 1958 年起至目前的 2019 年，則僅有 61 年。不過，第三共和的總統權力單薄，面對著分裂而強勢的議會，其所指派成立的內閣，經常有倒閣的危機。自 1870 年到 1940 年間，共計組成了 109 個內閣，平均每一個內閣壽命不及 8 個月；此外，自 1870 年到 1940 年間，歐洲國家之間不僅在海外的帝國主義及殖民衝突不斷升高，在歐洲也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

然而，法國悠久的憲法與內容的豐富，不應視為現代憲政史上的特例，而是個能特別明顯地表現現代性之衝突，也就是自由主義及反自由主義之鬥爭的個案。首先，自 1789 年大革命之後，自由主義的價值橫空進入了法國的政治體制，先是瓦解了封建體制的三級議會，接著逐步地去除了皇權與帝制的色彩，並在 1870 年的第三共和之後，確立了法蘭西的共和國體制。不過，也就在自由主義逐漸發展，成為政體的主流過程中，反自由主義的保守派也一再地出場：保皇派勢力在 1870 年之前不僅實力堅強，其間還曾擁立波旁王朝與拿破崙家族建立帝國。而在 1870 年之後，保皇派固然退出了政壇的主流，但自由主義的價值在法國政壇不僅區分了左右的不同立

場，左右之間還有分裂而多元的不同政黨——這與英美等國的政黨體制，有著相當大的差異。這是個「自我」色彩特別強烈的政治場域，而對應的也就有更多元的「我群」。有鑑於此，第三共和的議會也就是個更多元、更分裂的立法機關，並因此造成內閣難以組成、總統職權相對脆弱的處境；其次，自由主義也改變了歐洲的政治地景：19 世紀前半的歐洲協約，是爲了壓制在各國萌芽的自由主義；19 世紀中後在中歐地區，則以魯魯士爲中心，出現了對於西歐自由主義國家的挑戰，它在經濟上採取國民經濟，在政治上則是開明專制的帝國。1870 年普法戰後，德意志帝國成立；在 1914 年，德意志帝國組成同盟國對抗西歐的協約國；1939 年則以軸心國對抗西歐的同盟國。這些都是自由主義與反自由主義之間的對抗，法國位於地緣政治的中心，然而總統的權力單薄，在三次與反自由主義的戰爭中，均以投降收場。

## 二、總統的地位及 1958 年的制憲

二戰結束之後，百廢待興。然而，臨時政府總統戴高樂以更大權力重新執政的想法，並沒有被法國民眾所接受。1946 年 1 月 20 日，戴高樂被迫辭職。同年，議會提出制憲草案交付公投，通過後並建立了法蘭西第四共和，它仍然實施議會制，並與第三共和的體制相近，因此也面對同樣的問題：總統權力單薄、內閣短命而更迭頻繁，自 1946 年到 1958 年的 12 年間，就出現了 24 個內閣，平均執政半年，比第三共和更短。這不僅使得戰後復員計畫的推動相對困難，也一樣難以面對外在的危機——在 1945 年，法越爆發戰爭。1954 年，法屬印度支那獨立、越南共和國成立；同年，阿爾及利亞也發生了叛變，當地的法國殖民政府最初成功遏止了叛亂，但由於法軍所使用的手法過於殘酷，因而引起了法國社會極大的不滿，並受到公眾的質疑。1958 年，當法國政府建議與阿爾及利亞叛亂中的民族主義份子進行談判，第四共和隨即出現危機：法國殖民部隊將領於阿爾及爾發動 513 政變，要求戴高樂上台；5 月 25 日法國南部也出現反政府暴動，迫使時任總統的 René Coty 任命戴高樂組閣，而戴高樂則要求修憲，增加總統及行政部門的權力。該年 6 月，國民議會以緊急命令授權戴高樂制定新憲。9 月

28日，經過公民投票及國會普選，戴高樂及支持第五共和的政黨在國民議會中取得多數，而新憲亦以公投的方式，獲得82.6%的同意票通過。10月5日，法蘭西第五共和正式成立，戴高樂就任總統。

其實，在1962年法國同意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後，法國也就沒有直接與其它國家之間發生戰事。因此，看起來法國像是離開了「戰爭狀態」，對於總統權力的強調似乎也不像1958年成立第五共和之際那麼具有正當性，不過這樣的看法恐怕只是後見之明：首先，回到當時的時空裡，別說當時正是東西冷戰的高峰，法國還一直試圖在美蘇二強之外，發展出第三條道路，故而出現了戴高樂主義的外交政策——如空椅政策與低盪。其次，在東西冷戰的情境下，西歐國家提出了歐洲共同體的主張，而法國更是其中的關鍵。有鑑於此，固然隨著殖民地的獨立，而使得法國看似離開了「戰爭狀態」，但在冷戰的緊張裡，法國的國防及外交地位仍然大有可為，而總統的角色也還是具有關鍵的地位。為此，當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後，戴高樂再度進行修憲，將原本由選舉人團選舉產生的總統，改由公民直選，任期七年。同時，為了進一步強化總統的正當性，還規定了總統選舉為兩輪選舉制：在第一輪的投票中，獲得半數以上選票的候選人即可當選為總統，若第一輪沒有候選人獲得半數以上選票，則由得票前兩名的候選人進入第二輪投票，得票數較高者當選。1962年的修憲，對於總統的正當性具有強化的效果。

對於第五共和憲法的出現，以及1962年的修憲內容，可以從本文的分析架構，文明化歷程中的「自我—我群」認同平衡來解釋：自1870年以來的國際政經秩序，是個強調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義。換句話說，「自我」認同的一方受到高度的強調，而側重的也是「自律性市場」的機制；相對的，「我群」認同及「社會保護」的價值相對地受到壓抑。然而，古典自由主義在內造成了議會的強勢，在外則面對德國國民經濟的挑戰，而其解決的策略不僅是總統權力的鞏固，還需要更深層之政經體制的變遷——其中，「我群」的凝聚及「社會保護」的政策，即在價值及制度上受到重視，此即造就了凱因斯主義在二戰結束之後的地位，及以「鑲嵌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 (Ruggie, 1982) 為基礎所打造的國際政經秩序。有

鑑於此，總統權力的擴張也就在第五共和中得到實現，其目的不僅在於行政權的強化，以資面對強勢的議會及推動戰後的復興，還在於它凝聚了國族——這也就解釋了 1962 年修憲的意義。此外，透過對「我群」價值的重視來解釋第五共和在戰後的出現，也代表了新憲的出台絕不是對於個體化的反動，不單單因為「自我—我群」的認同平衡一直是文明化歷程裡的雙重運動，實際上第五共和之後的法國政壇裡，也絕少出現暗殺之類的政治暴力；相反的，此類暴力在強調古典自由主義的第三及第四共和裡，卻是屢見不鮮。暴力的減少，自然是文明化的具體表現（Elias, 1982）。

### 參、左右共治下的總統地位

總統代表的不僅是行政權的首腦，也是國家精神及價值的象徵（Kantorowicz, 2018）——在鑲嵌自由主義的國際政經體制裡，總統的地位在這兩個層次上獲得了正當性，是第五共和憲法之所以出現的原因。簡單地說，第五共和試圖強調的，是種以國家為集體的價值——也就是戴高樂所說的「為了法國」（Pour la France）。然而，作為一個自由民主的體制，在集體的價值之外，也要強調多元的價值。而且，行政權還需要受到立法權的制衡與監督。尤有進者，第五共和強化了總統的權力，但它仍保留議會制的精神，而內閣總理的任命雖然不需要議會多數黨的同意，但慣例上仍會尊重議會。職是之故，一旦出現了取得了行政權的總統及其政黨，並未在具有立法權的議會取得多數時，也就必須面對總統與內閣總理不同政黨的處境，這也就是所謂的「共治」。

#### 一、共治的現象及其在制憲史上的意義

截至目前為止，法國第五共和出現過三次左右共治，它們分別是在 1986 年 3 月 20 日至 1988 年 5 月 10 日的第一次共治，這是在社會黨的密特朗第一次擔任總統五年之後，組閣的是右派的席哈克。經過兩年的共治，社會黨於議會大選中再度取得多數，而這也就是密特朗的第二屆任期。經過五年執政之後，1993 年 3 月 29 日出現了第二次的共治，組閣的是巴拉杜



(Édouard Balladur)。再過兩年右派的執政，保衛共和聯盟的席哈克於 1995 年 11 月大選中當選為總統，並結束了第二次左右共治及社會黨的政權。第三次的左右共治是在席哈克擔任總統的第二年，1997 年 6 月 3 日社會黨的喬斯平 (Lionel Jospin) 組閣，經過五年的左派政府執政之後，政權於 2002 年 5 月 6 日重回保衛共和聯盟手上。茲將上述左右共治的時間，製成表 1 如下：

表 1：左右共治時間

共治時間	總統	總理
1986/3/20-1988/5/10	François Mitterrand 任期 14 年 (1981/5/21-1995/5/17)	Jacques Chirac
1993/3/29-1995/11/07	François Mitterrand 任期 14 年 (1981/5/21-1995/5/17)	Édouard Balladur
1997/6/3-2002/5/6	Jacques Chirac 任期 12 年 (1995/5/17-2007/5/1)	Lionel Jospin

落到歷史社會的脈絡裡，首先可以看到三次左右共治的時間是相連的，從密特朗擔任總統開始，在第一屆的七年任期間，五年之後第一次共治，社會黨在兩年之後再拿回政權，並開始密特朗的第二屆總統任期。但在五年之後，右派再拿到議會多數，組成第二次的左右共治，並在兩年之後取得了政權，而當時擔任總統的席哈克，則在兩年之後又經歷了第三次左右共治。換句話說，這不只是三次的左右共治，而是連續的兩任總統、21 年的任期間，持續性地左右鐘擺的現象。尤有進者，在第五共和的 61 年間，左右共治也僅在這 21 年間發生，不僅空前，而且截止目前為止，未再發生；其次，在這三次的左右共治裡，席哈克一直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第一次左右共治裡，他是右派政府的總理；第三次的左右共治中，他則是右派政府的總統，而在第二次的左右共治期間，他不僅是巴黎市的市長，並且是在 1977 年就開始擔任這個位置，一直到 1995 年當選總統為止。同時，他還是右派保衛共和聯盟的主席。其實，倘若僅是將焦點放在席哈克個人身上，並不容易呈現其在法國憲政史上的特殊意涵，還需要透過政黨，

也就是保衛共和聯盟的角度來理解席哈克在三次左右共治中的角色，與憲政史上的意義：保衛共和聯盟也就是所謂的戴高樂派，而席哈克在其從政早期，還是法國共產黨的支持者，並且是戴高樂在 1958 年上台之後，轉而投向保衛共和聯盟。

於是，重點也就不只是席哈克，甚至是戴高樂個人了，而是在二戰結束之後，法國政界對於強化總統職權的興趣。在前文裡，筆者已經透過「自我—我群」的認同平衡，及「自律性市場—社會保護」的雙重運動，解釋了第五共和所再現的，是對「我群」認同的重視，及對「社會保護」的興趣。而此一價值上的時代精神，還反映在戰後以鑲嵌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國際政經體制。於是，不僅在個體層面上會有戴高樂的上台，也在體制及價值上出現第五共和及戴高樂主義的政治聯盟。據此，也可以理解席哈克的出現——他對於法國共產黨的支持，完全表現了「社會保護」的價值，而對「社會保護」的興趣也可以很直接地與「我群」的凝聚結合，並生成對於戴高樂主義的認同。當然，這是在席哈克政治生涯的早期，當時的社會氛圍是對於「國族（我群）」及「社會保護」之間的價值，有相當親近的關係。然而，自 1980 年代中後開始，國際社會已經開始出現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也就是由所謂的柴契爾主義或雷根主義，所構建的國際政經體制。此即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而左右共治也就在這個時代的轉型過程中出現了——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三次的左右共和集中於此一時期。

## 二、第五共和的制度性效應及總統的地位

三次的左右共治在 2002 年結束了，而為了減少左右共治所造成的憲政緊張，法國在 2000 年將總統任期改為五年，並經公投之後通過。在席哈克的第二次任期裡（2002-2007），即未再發生左右共治的現象，之後上任的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及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等三位總統，也沒有發生左右共治的現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從 2000 年的修憲之後，法國再沒出現連任的總統，包括了席哈克本人，都是在任期即將結束之際，因為支持度太低，而宣告放棄爭取連任或是未能連任。其次，在席哈克結束任期之後，法國的政治仍持續地擺盪於左右之

間：2002 年的總統大選時，時任總理的社會黨候選人喬斯平在第一輪大選中，竟然只得到第三名，極右派人民陣線的勒班（Jean-Marie Le Pen）進入了第二輪，而喬斯平則呼籲支持者支持席哈克；2007 年當選總統的薩科齊是人民運動聯盟的主席，該聯盟較席哈克的保衛共和聯盟有更鮮明的右派色彩。不過，薩科齊的執政受到非常大的批評，雖然在 2012 年參加了總統大選，卻在第二輪投票時敗給了代表社會黨參選的歐蘭德。換句話說，選民的立場是席哈克的「中間偏右」，到薩科齊的「更右」<sup>1</sup>，到歐蘭德時的「向左轉」。2017 年，歐蘭德的左派政策評價不高，支持率太低，而使得他未參加當年的總統大選，當年的選舉由中間偏右的馬克龍當選總統。

表 2：2000 年之後的總統及左右政黨席次

時 間	總 統	政 黨	左-右政黨的國會席次
2002-2007	Jacque Chirac	RPR	140-358
2007-12	Nicolas Sarkozy	UMP	186-313
2012-17	François Holland	PS	280-194
2017-	Emmanuel Macron	REM	29-350

於是，我們可以大膽地提出一個問題：如果 2000 年並沒有縮短總統任期的修正案，左右共治的現象是否將會繼續？第三次的左右共治在 2002 年的總統大選後結束，當年社會黨的選情不佳，在總統大選的投票裡，時任總理的喬斯平不僅沒有進到第二輪的投票，甚至是由極右派的人民陣線勒班出線。以議會的席次來說，當年執政的人民行動聯盟獲得 576 個總席次中的 358 個席次，故而能建立絕對多數的執政團隊。相對的，在 1997 年以 255 個席次取得執政權，並建立左右共治的社會黨，卻在 2002 年的議會中減少了將近五成的席位，只得到 140 個席次；2007 年的選舉，雖然人民行動聯盟的薩科齊當選了總統，然而該聯盟在議會的席次卻是減少了 45 席，

<sup>1</sup> 這個「更右」的人民行動聯盟（Union pour un mouvement populaire, UMP），是在 2002 年由席哈克的保衛共和聯盟，加上法國自由民主黨及法蘭西民主聯盟的大部分組合而成的。在薩克齊於 2012 年下野之後，成為法國主要的反對黨與議會的第二大黨。2015 年 5 月 30 日，更名為共和黨。

只拿到 313 個席次；相對的，社會黨從谷底反彈，增加了 46 個席次，從原本的 140 席變成了 186 席。換句話說，左右之間的席次是一來一往的消長，而社會黨的氣勢，在 2012 年的選舉中達到了高峰，當年不僅歐蘭德在總統大選中獲勝，社會黨在議會裡還拿到了前所未有的 280 席。但是在 2017 年的選舉中，不單單歐蘭德沒有參加競選，社會黨的席位也降到了史無前例的最低點，29 席，將近只有五年前的一成。藉著在 2000 年之後議會的席次及其間大幅度的變化看來，左右共治是很有可能再度發生的，只是由於總統任期的改變，並配合了議會改選的時程，而使得它在制度上不容易出現，而如果左右共治的狀況再度出現，那很可能是發生在總統解散國會，並且支持總統立場的派系只有少數的情況下。

那麼，如果由於總統任期的改變，而大幅減少了左右共治出現的可能，那麼研究左右共治的意義為何？首先，回到上述的現象，可以看到左右之間的消長在第五共和時期不斷地上演，而且其間席次增減的幅度，更是相當驚人。這顯示了法國民眾政治立場的高度流動性之外，也代表作為總統的國族象徵，已然逐漸地退去了對特定個人的附著，才會使得在 2000 年修憲之後的總統，沒有一位連任成功。這與第五共和期間，特別是隨著 80 年代之後管理主義的政治形態的發展直接相關，即政治場域裡的競爭，逐步地從價值間的衝突，轉而成爲工具性之治理的差異（Dulong, 1990）。於是，左右之間的立場雖然存在，但選民對於立場的黏著性低，對於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看法，也表現出高度的工具性。也就是說，如果未能達成其政策目標，很容易地就會被選民所淘汰，因此也就出現左右持續搖擺、振盪的現象——現任的總統馬克龍在 2017 年上任之初，也是以高得票率的政治明星出場。然而，在其執政兩年不到的時間，即已光環盡退，並且面對著黃背心運動的挑戰；其次，持續地在左右之間搖擺、振盪，也代表了政治人物所提出來的政策有效性不高，而這也是國家在全球化時代裡，所面對的困境。前文中即已提到，共治的出現與 1980 年代中葉以來的全球化發展之間，存在著時序上的對應。

不過，藉著文明化歷程的理論，本文所採取的長時期視角是否在第五共和之外，仍爲法國憲政發展史提出了解釋，並從中呈現政治的意涵？而

這也就是在左右共治現象恐怕不再出現之後，研究左右共治的意義所在。就此一問題，本文首先指出，個體化是文明化歷程裡持續的現象。在這過程之中，也就出現了「自我—我群」認同的平衡，及「自律性市場—社會保護」的雙重運動。然而，促成我群認同之所以有效的符號，其實隨著不同的時空脈絡，也有不同的有效性：1870年之前，君主制仍然有效，不僅讓波旁王室重回巴黎，拿破崙家族也受到擁戴，而建立了第二帝國。這種將「國族」的意象，緊密地與特定家族或個人連結的現象，使得第三共和中還存在著保皇派，甚至在第五共和初期，也附著在戴高樂身上，但是其中的皇權貴族色彩，已然逐漸地退去，國族意象甚至在2000年之後，還與個人之間逐漸脫節，而使得每一任總統都未再連任；其次，此一表現了國族意象的「我群」，實則與「社會保護」的象徵結合，並且在制度上可與「自律性市場」的形式對應：在二戰之前，國際政經體制是以自由放任為主的「古典自由主義」。因此，不單單議會表現出多元分裂的狀態，代表行政權的國家也在自由放任的價值底下，相對脆弱、無力；二戰之後初期是強調「鑲嵌自由主義」的時代，「社會保護」的價值受到重視，因而不僅行政權擴大，第五共和也一再地突顯總統的象徵意涵；1980年代中後是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管理主義的風格使得總統的象徵意義大為降低，呈現的是工具性的價值。換句話說，透過長時期的視野，本文呈現了總統的地位及其正當性符號的內涵，而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左右共治提供了一個正當性符號逐漸轉型之歷史時刻的現象。

具體地來說，總統在法國憲政史，除了是行政權的首腦，也是國族的象徵。當然，這兩個身份所呈現出來的有效性，並不必然具有持續的有效性，它得對應著國內外的社會形態。然而，就以第五共和來說，左右共治的時期裡，總統經常由於同時具有這兩個身份，而更容易會有正當化的效果——這是為什麼在三次的左右共治裡，第一次及第三次的共治之後，會是總統及其政黨聯盟取得執政的正當性，而第二次的共治，則其實是整體的社會黨政權之正當性已然不足，才使得共治結束後，社會黨政權隨著密特朗的下野而結束。

## 肆、結論

在當下台灣學界對於法國第五共和的研究非常地多，直接的原因也就在於目前的憲政體制與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之間，有體制上的類似。本文在諸多研究之外，另闢蹊徑地從文明化的角度來理解第五共和及左右共治的意義，一方面固然認為體制的發展，有其特定對應的時空背景，並不容易從中獲取具有理論意涵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卻也認為透過政治學的核心概念，正當性的符號，能夠為此間的研究提出一些能夠進一步研究的元素。有鑑於此，本文即在「自我—我群」的對立之間，根據不同時期之「自律性市場」的形式——包括古典自由主義、鑲嵌的自由主義，及新古典自由主義——而呈現對應時期，對於「我群」的需求，與對「社會保護」有效的符號。如此一來，不單單能理解法國憲法裡的元首地位，及隨之而來的職權大小，還能了解民眾對元首之個人的附著性。換句話說：一旦總統之象徵意涵愈是附著在個人身上，其個人的道德性質愈高；相對的，則是其工具性愈強。由於全球化之新自由主義具有強烈的管理性格，因而總統之個人道德性降低，而工具性增加，故而左右之間的擺盪益加明顯。但由於總統任期的縮短，並與國會選舉配合，而使得左右共治的狀況不容易再出現了。

## 參考文獻

- 劉名峰，2019，〈戰爭狀態、元首地位與憲法變遷：法國制憲中的結構性力量〉收於施正鋒（編）《各國制憲運動》頁 77-100。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翰蘆出版社。
- Dulong, Delphine. 1997.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onfiguration et position prééminente," in Alain Garrigou, and Bernard Lacroix, eds. *Norbert Elias: La politique et l'histoire*. pp. 266-89. Paris: La découverte.
- Elias, Norbert. 1982. "Civilization and Violence: on the State Monopoly of Physical Violence and its Infringements". *Telos: Critical Theory of the Contemporary*, No. 54, pp. 134-54.
- Elias, Norbert (翟三江、陸興華譯)，2008。《個體的社會》。中國南京：譯林出版社。
- Elias, Norbert. 2010. "Figuration," in Johannes Kopp, and Bernhard Schäfers, eds. *Grundbegriffe der Soziologie*, pp. 75-78. Frankfurt: Suhrkamp.
- Elias, Norbert, 2014，王佩莉、袁志英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發生和心理發生的研究》。中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Greenfeld, Liah. 1985. "Reflections on Two Charisma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6, No. 1, pp. 117-32.
- Kantorowicz, Ernst H. (徐震宇譯)，2018。《國王的兩個身體》。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Polanyi, Karl (黃樹民譯)，1989。《鉅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台北：遠流出版社。
- Ruggie, John Gerard.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s: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pp. 379-415.

# Regime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French Fifth Republic: The Role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President at the Globalization Period

Ming-Feng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Quemoy, TAIWAN*

## Abstract

How to understand the appearance of co-habitation of the 5th Republic of France by referring to its social context, which is an international regime based on the neoliberalism? The case of French constitution is not an exception, because of its far above average constitution-making, but a very sensitive example with the dynamic of “I-We balance,” which stands at the very center of civilizing process. In other word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leads to the individualiza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search for communitarian solidarity on the other. This dynamic stays not only within the nation -state, but also without as the core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among which the neoliberalism prevails after the 1980s. The neoliberalism strengthen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I-We balance” because of which the cohabitation happens three times from the mi-80s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 Moreover, it makes the state vulnerable in the face of the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esident obliged to play a symbolic role for the nation. Nevertheless, his legitimacy comes from the role, not from himself as the managementism of the globalization jeopardi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harisma for the legitimation. As a result, the fluctuation of the public opinion continues, and non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has been re-elected after 2000, when the Constitution was revised the term of the presidency from 7 years to 5 years. This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makes the cohabitation difficult to happen again.

**Keywords:** neoliberalism, civilizing process, cohabitation, legitimacy